



卓越学术文库 ■

初唐弘文馆与文学

CHUTANG HONGWEN GUAN YU WENXUE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梁尔涛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商战(10)目錄點評序

初唐弘文馆与文学

CHUTANG HONGWUGUAN YU WENXUE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梁尔涛 著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文学领域更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本书以时间为轴，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包括诗、词、赋、散文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作品和创作特点。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相关的史料和背景知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文学风貌。

本书不仅是一本文学史，更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学著作。通过研究初唐弘文馆与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面貌。同时，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初唐文学的新视角，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ISBN 978-7-5692-131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唐弘文馆与文学/梁尔涛著.—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5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1718-2

I . ①初… II . ①梁…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7701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85 千字

版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1718-2 定价: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序



说起来，我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三十多年了。从唐代文学出发，读过一些书，思考过一些问题，发表过一些议论。但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往往是想到一个不错的选题，便做下去，缺少对文学史发展的整体性思考，也谈不上对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把握。后来我有幸师从钱仲联先生攻读明清诗文博士学位，这才使我在古代文学研究上产生了一些观念的转变。钱先生乃一代大家，学问淹博，上下贯通，论文衡人总不拘于一隅，追溯源流，探论影响，最能开启心智。正是攻读了明清诗文以后，促使我对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重新加以思考，逐渐形成了“分层性群体观”。

所谓“分层性群体观”，是指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不同层次的群体。除个别特例外，一般来说个体作家总倾向于或归属于某种群体，而群体又明显分为高层（台阁）、中层（莲幕）、基层（布衣）。因政治身份转换而形成文化空间转变的士绅是三个阶层的连接者，成为最显著的中坚力量。如果将三个层面看作一个等差台阶，那么总体上看，自汉末以降，古代文学的发展便呈现出文化和文学权力下移的趋势；而就每一个朝代的始末来看，也同样存在文化和文学创作中心由朝廷向地方转移的倾向。历史的全部画卷，实际上是各个历史段落结合的整体性复现。这种下移的过程，正是雅俗鸿沟逐渐填平和消解的过程，也是文化和文学逐渐繁荣兴盛的过程。宋元之际，产生了遗民这一特殊群体，其后断代性文化和文学发展状况显出某种复杂的态势，但重心下移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

本着这一认识，我对唐代文学以及明清诗文的研究，既注意高阶层群体，也注意基层性群体，而聚焦点往往在那些具有朝廷和民间经验的士绅集团。我为研究生作论文指导，也多根据这一原则来选题。尔涛的这篇论文就是对唐代台阁群体的研究，所取的时段正是“开朝之初”，是文化和文学权力集中在高层的那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期。

我和尔涛的最初认识，大约是十多年前在河南举行的某次学术会议上。他在会上听我宣读了论文，尤其会间交谈了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看法后，便

决心报考我的研究生。那时,他已经是河南一所高校的老师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使他放弃工作,到苏州连续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一下子在异乡江南住读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这本著作的原型,就是他的那篇硕士论文。

唐代文学界一直有一批重要学者提倡并实践着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傅璇琮先生和陈尚君先生近十多年先后担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更使这一学风得以发扬光大,这也是海内外学界一直对唐代文学研究给予好评的原因之一。我是非常赞成走文史结合的道路的,也要求学生们踏踏实实地沿着这条路走。虽然人的天分和性情各有不同,实践中并没有强求一律,但尔涛能相当自觉地这样做,可谓深得我心。

这个题目相对来说比较“硬”一些,不允许绕开文献,不允许离开考证,要将“弘文馆”“学士”相关问题一一厘清,并且放到初唐的政治背景和文学背景中展开论证,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作为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来说难度系数较高。所幸尔涛肯坐冷板凳,不辞在故纸堆里成年累月爬梳发掘。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拿出了相当规模的论文,并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虽然在他完成本课题后不久,李德辉博士和吴夏平博士先后出版了唐代文馆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论著,对这一课题极具贡献,但回头来看,尔涛当时从“初唐弘文馆与文学”的关系来研究,并口开得小些,挖掘得深些,还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尤其在博士毕业后,他又花了不少时间,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增补,并在原有基础上续写了高宗至中宗朝弘文馆及其与文学关系研究部分,弥补了初成时的阙憾,使“初唐弘文馆与文学”研究有了完整的格局,学理上的环节也缜密衔接起来,由此本书的学术价值进一步得到提高,当可与学界同类研究成果并案而观。

我在《唐诗演进论》中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做过一些梳理,对盛唐到来之前近一个世纪的初唐文坛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盛唐自然是文学高原上的一座奇峰。但盛唐之形成,放眼观之,与漫长的先唐文学发展的积累有关;切近来看,与初唐近百年文学力量的渊蓄、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经验的形成有关。而在初唐文学舞台中心,站满了名盛一时的文馆学士,其中主要是弘文馆学士。这些学士的文学创作中,镌印着初唐诗歌发展的步履。无论接踵而来的李、杜、王、高、岑等人,说是对初唐诗歌的承变也好、反拨也好,都离不开他们之前近一个世纪的深广背景。这是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初唐的原因,也是必须走进弘文馆这个文化空间的原因。

尔涛的这部著作,为走进初唐弘文馆文化空间做了可贵的拓路工作。这幅拓路图,很多地方描绘得深入细致、笔致清朗、新意迭现、引人入胜,当

然也有些地方提要钩玄、意在启发，还有渐次展开的余地。这几年，尔涛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同时，还在完成博士后研究项目，繁忙的行政事务也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年轻学者跋涉之不易，我是能够体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颇对他将论文修改竣事，即将出版而感到高兴。匆书数语，聊充序言。尔涛青春健笔，学术宏图方展，我希望他在本课题研究上推出新的成果，也期待其博士论文能早日面世。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另一个层面——唐代家族文学的研究——那是一片更新颖、更广阔的文学天地。

罗时进

2013年11月11日书于吴门

引言	1
第一章 唐前文馆的历史沿革	13
第一节 周汉时期的文馆	1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馆	15
第二章 唐宋朝弘文馆开设的背景及意义	20
第一节 唐宋开科取士与科举制度和选官制度	20
第二节 唐宋科举文化及科举考试的演变	25
第三节 唐宋科举制度下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	32
第三章 太宋朝弘文馆的筹备与文学建设	40
第一节 太宋筹备的概况	40
第二节 太宋时期的文学与学术发展	50
第三节 文馆雅集与文学理论研究	58
第四章 高宗朝弘文馆的发展态势	68
第一节 高宗撰写的典制与诗文	68
第二节 高宗时期对文馆的重视与改革	71
第三节 高宗时期文馆的设置与管理	75
第五章 契宗的弘文馆文库与藏书	82
第一节 契宗对文馆的重视与改革	82
第二节 契宗对文馆的管理	97
第三节 文馆与文学研究	106
第六章 武则天、中宗朝弘文馆的振兴演进	112
第一节 武则天时期政局变化与弘文馆兴衰	112



引言	1
第一章 唐前文馆的历史沿革	13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文馆	1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馆	15
第二章 太宗朝弘文馆开设的背景及意义	20
第一节 弘文馆开设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意义	20
第二节 关中本位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弘文馆的开设	25
第三节 天监创制的历史启示与弘文馆的开设	32
第三章 太宗朝弘文馆的整合与文学建设	40
第一节 文馆整合的文化、文学意义	40
第二节 氏族观念变化与文学家族整合	50
第三节 文馆雅正诗学观与诗风	58
第四章 高宗朝弘文馆的发展演进	68
第一节 贞观遗风的继承与消解	68
第二节 科举制度对弘文馆人员结构的影响	77
第三节 帝后政争与文馆学士的代际更替	87
第五章 高宗朝弘文馆文学及其新变	92
第一节 文学型学士增多与文学发展	92
第二节 文馆学士诗歌平议	97
第三节 文馆文人分途与文学新变	106
第六章 武则天、中宗朝弘文馆的衰兴演进	114
第一节 武则天时期政局变化与弘文馆衰落	114

第二节 中宗朝弘文馆中兴及其文学化转向	119
第七章 景龙弘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	129
第一节 文馆活动的娱乐化及其影响	129
第二节 文馆学士对应制诗歌艺术的发展	135
第三节 后世对景龙文馆学士诗歌的接受	142
附录一 初唐弘文馆学士考述	150
附录二 已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	196
走向隐逸：唐初朝野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	196
唐李元轨墓志所涉北门学士问题献疑	204
论唐代郡望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209
初唐《姓氏录》与文人从军诗的兴盛	217
参考书目	225
后记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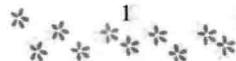
变更合浦

引言

唐世帝王极重文馆，把文馆视为藏蓄典籍、延揽人才、进行国家政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弘文馆的开设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唐初弘文馆开设时的机构定位是文化教育机构，主要职能是校刊书籍、教育生徒、参与各种礼制建设等，但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出于政治建设的需要，它的职能渐渐越出既定界限，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事实上起到了“天子秘书处”的作用。《玉海》卷一百六十五引《翰林故事》云：“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材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輿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当时号为十八学士。”^①这些弘文馆学士从起草诏令、封驳奏事，到文化政策的制定、文治方略的实施等，皆能参与。他们入朝则辅弼王政、盛饰文治，退朝则宫廷宴集、诗酒唱酬，携政治与文化的双重优势，激扬风雅，引领天下风骚，对政治、文化乃至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弘文馆及其学士是我们研究唐代文学，特别是初唐文学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弘文馆的研究史料主要集中在《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弘文馆”条、《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弘文馆”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条、《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条中，《贞观政要》《通典》《文献通考》等相关典籍亦有零星记载。综合上述典籍，可以对初唐弘文馆的历史沿革、机构功能、人员配置等情况做一大致勾勒。

^① [宋]王应麟：《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引该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脚注，一般只随文注出卷数。





一、馆名更变

《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条记：

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弘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为昭文馆，避孝敬讳故也。二年，又改为修文馆……景云元年，馆中学士多以罪被贬黜，宰臣遂令给事中一人权知馆事。二年三月八日，复改为昭文馆。至开元七年九月四日，依旧改为宏文馆。^①

据此可知，弘文馆始置于武德四年（621）正月，初名修文馆；武德九年（626）三月，改为弘文馆；神龙元年（705）十月十九日，又改为昭文馆；神龙二年（706），复改为修文馆；景云二年（711）三月八日，再改为昭文馆；开元七年（719）九月四日，仍复旧名，改为弘文馆。自开元七年至唐亡，弘文馆之名未再变更。由于此文馆以“弘文馆”之名存在时间最长，故后世往往以弘文馆通称之。本书中凡涉及此文馆处，除引用文献以及根据上下文语言环境必须注明“修文馆”“昭文馆”“修文馆学士”“昭文馆学士”外，亦皆称“弘文馆”“弘文馆学士”。

二、馆址变迁

武德四年，弘文馆初置，馆址在门下省东。宋敏求《长安志》卷六记：“弘文馆在门下省东，武德四年置，聚天下书籍。”“日华门东有门下省，省东弘文馆，次东史馆。”太宗初即位，移至弘文殿侧，正式定名为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条记：“太宗初即位，大阐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贞观三年，移于纳义门西。九年，又移于门下省南。其后移仗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贞观政要》卷七皆云太宗初即位时所置弘文馆位于“正殿之左”，比“弘文殿侧”方位更明确。玄宗朝韦述作《两京记》，其中记：“弘文馆在门下省东。”（《玉海》卷一百六十五）可知弘文馆此时已移回初建之址。要之，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其址虽偶有移至他处的情况，但大部分时间都在门下省东。

^①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0~951页。后引该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脚注，一般只随文注出卷数。

三、文馆职能

此处所云文馆职能，包括弘文馆的机构职能和弘文馆学士的实际职掌两个方面，主要有五大职能。

第一，图书馆藏。弘文馆开设之初，最基本的机构职能就是国家藏书之所。《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弘文馆”条记：“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这一职能在唐代三百年中始终存在。

第二，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是参议礼制，编撰图书。唐初以儒治国，定礼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参议礼制也是弘文馆学士的职内工作。《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弘文馆”条记：(弘文馆学士)“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馆中文人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编撰、校理图籍。《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弘文馆”条记，“学士掌详正图籍”，“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又有楷书手、拓书手、笔匠、装潢匠等若干，负责缮写等工作。而负责督查的是门下省的给事中，“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若弘文馆图书之缮写、讎校，亦课而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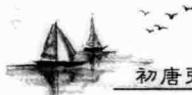
第三，贵族教育。弘文馆有教育生徒的职能，其教育对象是皇室和高级官员子弟，属于贵族教育，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书法、经学、史学。《唐六典》卷八记：

补弘文、崇文学生例：皇宗缌麻已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

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二年，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试贡举，兼学法书。^①

第四，政治参议。弘文馆学士参议政治分两种情况：第一，因为学士是兼官，其本官多有清华贵重之职，据本书后附录一《初唐弘文馆学士考述》统计，弘文馆学士仕至宰相者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所以他们在发挥本官政治

^①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5页。后引该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脚注，一般只随文注出卷数。



职能时,兼官身份必然会产生隐性影响与作用;第二,弘文馆本是文化机构,而在某些特定时期帝王赋予其参议政治的职能,甚至成为“天子秘书处”,能对朝政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前一种情况普遍存在,但其政治影响多为个体的、隐性的,不易明确界量。后一种情况的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唐会要》卷六十四记:“太宗初即位,大阐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杜牧《杨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馆等制》云:“十八学士详考理乱,铺陈王道,此乃贞观之故事也。”^①可见参议政治,以佐王道是贞观时期朝廷明确规定弘文馆学士的重要职能。

第五,待诏侍从。《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记:“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所以,侍从待诏也是弘文馆学士的本职职责。由于学士基本上都是兼官,故其侍从待诏活动大都具有临时差遣性质。除学士外,弘文馆中还有专职的待诏人员,以备随时供奉帝王。

四、馆中人员

弘文馆中人员构成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学士官。《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门下省”条下记:“弘文馆。学士无员数,自武德以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故事:五品已上称学士,六品已上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学士不定员数。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自垂拱已后皆宰相兼领,号为馆主。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据此可知,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门下省有给事中四员,其中一员分判弘文馆事。弘文馆中学士官有三类:学士、直学士、直馆。其任职资格是,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上称直学士。关于直馆,上引资料中未说明其任职资格,《唐六典》卷八记:“又有文学直馆,并学士无员数,并以他官兼之。”可见直馆也与学士一样都是兼官,而且当时也是将他们视同学士的。《玉海》卷一百六十五引《翰林故事》云:

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材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当时号为十八学士。弘文馆学士褚遂良馆主、杜正伦直

^① [清]董浩:《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0页。后引该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脚注,一般只随文注出卷数。

馆、马嘉运、欧阳询、朱子奢、盖文达、谷那律、萧德言、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赵弘智、吕才、谢偃**直学士**。

引文中加粗的字为原文中的注释文字，说明当时无论馆主、直馆、学士、直学士都通称弘文馆学士。馆主一职，起初其任职资格未有明确规定，垂拱后，始以宰相兼领，因成故事。本书后文论述时，亦将初唐弘文馆馆主、学士、直学士、直馆通称为学士。这些学士政治地位高、文化素养好、文学实绩突出，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

第二部分是职事官，负责日常馆务活动，其组成人员包括讲经博士、详正学士、待诏以及校书郎等。这部分人承担的是弘文馆中的日常具体事务，都具有一定的职事，属于职事官，如讲经博士负责日常的教学活动、校书郎负责馆中日常校讎工作等。他们当中虽然也不乏饱学之士，但政治、文化地位无法与学士相比。

第三部分是学生。关于弘文馆中的学生，贞观初是二十四人，后以三十人为定制，都是皇室及高官子弟。这部分人在典籍中往往被称为弘文生，但在某些墓志等资料中，出于谀墓的动机，有被称为弘文馆学士的，显然是为了攀附学士的宠荣身份，是不足采信的。^①

第四部分为下层吏佐。据《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条记，弘文馆中又有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等，这部分人不入士流，地位更为低下，所从事的多是技术性而非政治性、文化性、学术性的工作。

在这四部分人中，学士官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职事官亦有所涉及，第三、四类与文学关系不大，本书基本未涉及。

二

在了解了弘文馆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再来说明一下，在初唐诸文馆中何以要选择弘文馆作为研究文馆与文学关系的对象。从政治、文化地位来看，在盛唐翰林院出现之前，初唐百年中最重要的文馆首推弘文馆。考察初唐三馆（弘文馆、崇文馆和史馆）可以发现，三馆学士的身份大多交叉，弘文馆学士中多有兼任崇文馆学士和兼修国史者，也就是说，三馆学士可以视为同

^① 如张九龄《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中记墓主裴光庭：“弱岁居太尉宪公丧，幼以孝闻，寻补宏文馆学士。神龙初明经擢第，授家令寺丞。”（《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裴光庭尚幼时，且尚未及第，怎可为弘文馆学士？当是以门荫入为弘文馆生。



一个大的学士群体。但是与史馆隶属于秘书省(某些时段也曾从秘书省独立出来过)相比,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其最高长官侍中是宰相之职;与崇文馆是太子学馆相比,弘文馆是朝廷的文化教育机构,有时候发挥的是“天子秘书处”的作用,故其政治地位最为重要。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初唐诸学士群体中,弘文馆学士群体规模最大。据吴夏平统计,高祖至中宗时期,弘文馆学士一百零六位,崇文馆学士五十一位,兼修国史四十一位^①。虽然这三个数字仍需进一步考校,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三馆学士的群体规模:弘文馆学士的数量比其他两馆的总和还要多。考虑到弘文馆学士兼任其他两馆学士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其他两馆中的学士就是弘文馆学士中分流出去修史和辅佐太子的人员。

除了这三馆学士外,初唐还有若干临时性学士群体,如芳林门学士、北门学士以及珠英学士等。据现存资料考察,这其中最大的珠英学士群体人数不超过五十人^②。这类学士群体大都是因为编撰图籍而临时集结的,其组建的编撰机构也非常设机构,大多是随事权置,事毕职结。另外,初唐还有一些王府学士群体,如贞观朝魏王李泰曾开设文馆,编撰《括地志》等图籍^③,其学士规模和政治地位均无法与东宫学馆崇文馆相比,更比不上弘文馆。

从文化与文学贡献方面来看,初唐诸文馆中同样以弘文馆为最大。陈隋之际,兵燹不断,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李唐立国之初,文化事业可谓百废待兴,特别是李世民欲以文教治理天下,文化建设的任务更重,而对其贡献最大的当属弘文馆学士。如唐初儒家经典的整理工作是以弘文馆学士颜师古等为首的儒臣主持开展的,太宗、高宗朝官方谱牒的编撰是以弘文馆学士岑文本、许敬宗、李义府等为首编撰的,贞观礼、永徽礼的修订弘文馆学士颜师古、刘伯庄、许敬宗、李义府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行文化普及,朝廷非常重视类书和总集的编撰,从《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到《文馆词林》《瑶山玉彩》等的编撰,弘文馆学士都是骨干力量。

初唐诸学士群体中,弘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成就最大,艺术水准最高。贞观时期,首批弘文馆学士中如虞世南、褚亮、岑文本、许敬宗等皆凭借文学

① 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98~454页。

② 据现存资料来看,珠英学士集团是初唐临时性学士群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徐俊《珠英集前记》中考述,珠英学士集团成员仅四十七人。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③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记:“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十二年,司马苏勣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



之才拔起乱世，位至通显。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云：“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一）其中虞世南、岑文本、许敬宗、来济、褚遂良皆为弘文馆学士，他们的诗歌远包齐梁，高振唐音，使得唐诗在发轫之初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胡震亨《唐音癸签》引颋叟语曰：“贞观、永徽吟贤，褚亮、杨师道、李义府、许敬宗、上官仪其最也，吉光片羽，仅传人口。仪‘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响清越，韵度飘扬，齐梁诸子，咸当检衽矣。”^①其中褚亮、李义府、许敬宗、上官仪也都是弘文馆学士。

初唐后期，弘文馆学士不但在政治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唐代古文大家独孤及指出：

（五言诗）历千余岁，至沈佺期、宋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②

这其中的沈佺期、宋之问就是指景龙文馆两位最著名的学士：沈佺期、宋之问。独孤及认为律诗定型于这两人之手。大诗人元稹也持这种观点：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③

今人陈铁民先生则在考察了初唐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律诗定型于“武则天、中宗朝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认为“学士们既是宫廷诗苑的主力，又能经常得到聚集在一起从事创作、探讨诗艺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就有了完成律体定型任务的条件与可能”。“在初唐诗人中，五言新体诗合律程度最高的是一些学士，这种情况的出现当非巧合，而是学士们在‘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时，对选择和肯定粘式格律有了共识或达成默契的结果。由于这些学士居于当时诗坛的中心地位，具有足够的威望

^①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引该书皆据此本，不再一一脚注，一般只随文注出卷数。

^② [唐]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见《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八，第1743页。

^③ [唐]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见《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四，第2946页。



和影响力,其肯定与选择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律体的形式也就固定了下来。又,修文馆(弘文馆)学士有‘兼训生徒’之责(弘文馆有学生三十人,皆皇亲国戚及功臣贵官之子),这使学士们能够通过‘讲学授徒’的方式将已定型的律体向社会传布,从而也有助于律体的凝定。”^①律诗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一任务是由初唐后期的弘文馆(修文馆)学士完成的,其文学史贡献是巨大的。

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谈杂录”云:“文章有台阁体,当与古文大家外另列一品,不可偏废。唐诗人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张说,亦属台阁体裁,翰苑清华者宜宗之。”^②杜、苏、李、张皆为中宗景龙文馆学士,他们的诗歌是一般的“翰苑清华”文人所应崇尚的,那些梦想进入“翰苑清华”的士子想来更是对此艳羡不已了,而在封建社会,这样的文人又何止千万,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弘文馆学士自身的文学创作实际,还要重视馆阁文学风尚对时代诗文风气的引领作用。

三

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我们还需对初唐文馆研究的时间断限问题做一说明,因为“初唐文馆”与“初唐文学”这两个概念所内含的时间意义虽基本一致,但也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界定二者的参照对象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学界在界定初、盛唐文学分期的时间断限时,往往以标志性文人或文人群体的代际更替为参照。如袁行霈先生主张将初唐诗歌的下限划到开元八年(720),把开元九年(721)作为盛唐的开始,并指出在这一年之前,初唐诗人如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均已去世,而从这一年开始,盛唐的诸位大家开始逐渐走上诗坛^③。但是从文馆的角度看,初、盛唐的划分则不能仅看学士群体的更迭代谢,还必须兼顾到重大的、有象征意义的文馆活动。如罗时进先生指出:

从初唐文馆与诗风演变的关系来考察,我认为可将初唐的下限确定于景龙四年(710年,即景云元年),这一年之前,陈子昂和四杰已全部辞世,四友中杜审言、崔融、苏味道也已作古,也就是说,曾经给初唐诗

① 陈铁民:《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第59~64页。

② [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36页。

③ 袁行霈:《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第74页。



坛带来最后光亮的星星大都已陨落了，而宫廷文馆的最后一次大唱和也于景龙四年四月六日在兴庆池“急舸争标”的竞渡中落下帷幕。六月，中宗为韦后、安乐公主鸩毒而卒，随之李隆基起兵尽诛韦、武之党。紧接着数度参与宫廷盛会的上官婉儿被杀，同年宋之间等学士以交通韦、武之罪被黜。此后的宋之间和其他一批文馆诗人实际已成为初唐诗坛的“遗民”，其创作已不复为原态意义上的初唐诗歌了。

罗时进先生在关注文馆诗人群体的同时，特别指出了事件，即景龙文馆唱和活动，在划分初、盛唐文馆文学时的标志意义。如果我们再把眼光往开元年间延伸一下就可发现，景龙文馆唱和后，下一次大型的文馆文化活动就应是开元六年（718）前后的丽正院修书学士们整理图籍活动。《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马怀素传》记录了当时的修书学士名单：

是时，文籍盈漫，皆臭朽蟬断，签商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征、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丞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愬、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斐、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部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甫、崔汚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

很明显，这已是一批全新的学士，像韦述、王湾此时尚是暂露头角，他们是属于盛唐的。而景龙文馆学士中沈、宋一辈的，此时已无一人入院。据此可见，把最后一次景龙文馆唱和作为初唐文馆文学活动的终结，是符合唐代文馆文学史发展实际的，这种划分思路对于唐代馆阁文学史的分期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回过头来，我们再审视初唐文馆研究的时间起点。这一点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武德四年正月弘文馆的前身修文馆的开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个时间外，这一年的十月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十八学士登瀛洲”之事。十八学士是指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后首批入馆的十八位学士，他们是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

